

香港基督教史研究之史料與議題 ——以倫敦會女傳教士柏嘉里 (Katherine Brameld, 1906-1984) 的《青山》(*Clear Mountain*) 為例

湯泳詩

香港中文大學

Th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一 引言

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範疇中，仍有很多嶄新的史料和議題有待學者整理和分析。本文即嘗試利用差會檔案館所藏的女傳教士文獻史料，來論述傳教士文學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範疇的角色，務求拓展有關範疇的史料運用和議題方向。

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範疇中，文字史料一向是主要的研究素材。然而，學者素來對官方的資料比較重視，如教會會議記錄，財政記錄、傳教士報告、牧師報告、教會年刊以及教會特刊等。¹ 近年，學者也趨向開拓更多元化的史料，如口述史料和圖像史料。學者漸漸確立口述史料為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並不單以輔助及補充文字史料之

¹ 有關此範疇之研究述評，可參李金強：〈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興起及其發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創刊號（1998年），頁5~30。

用。口述史料能為課題提供新穎與獨特的發現，並為研究範疇增添更豐富的內涵。² 此外，圖像史料一直多被視為插圖式的點綴品，並沒有得到有關學者的高度關注。事實上，圖像史料極為珍貴，她能提供文字與口述史料以外的歷史資料。學界亦慢慢對圖像史料加以重視。³

倚靠以上史料的運用與分析，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議題和方向，主要包括教會與翼鋒教會的二分研究議題，以及歷史分期的研究方向。首先，教會與翼鋒教會的二分研究議題，即宗派與教會事業的研究。學者重點整理各大宗派教會的歷史，繼而綜述教會各項事業，包括教育、醫療、慈惠與出版的貢獻。第二，歷史分期的研究方向，即以歷史分期為方法，人物研究為中心，建立研究框架。學者多以1949年為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分水嶺，1949年前香港教會從屬於華南教區的一部分。1949年後，香港基督教才因政局逆轉而闖出新局面。⁴

本文旨在說明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範疇中，除了以上的史料和議題，傳教士文學也可以成為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史料之一，並能為本範疇開拓更多嶄新的研究課題和方向。本文首先介紹倫敦會 (LMS,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女傳教士柏嘉里 (Katherine Brameld, 1906-1984) 於1971年寫成的《青山》(Clear Mountain)，並繼而以此文本作為分析的對象，以剖析傳教士文學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角色，即基督教女性文學的啟示、傳教士與華人的中西身分互相了解，以及香港基督教史科際整合的研究等等，從而說明傳教士文學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範疇的角色。傳教士文學所提供的貢獻，將有助我們重新認識香港基督教的面貌。⁵

² 對於口述歷史的使用情況，可參湯泳詩、盧龍光：〈香港基督教口述歷史研究述評〉，《近代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集刊》第5期（2002~3），頁66~78。

³ 本人亦曾以巴色會檔案館館藏的歷史照片進行有關展覽。至於詳情，可參展覽圖錄，湯泳詩：《瑞澤香江：香港巴色會》（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2005）。

⁴ 參李金強：〈中國基督教史研究之興起及其發展〉，頁5~30。

⁵ 有關文學與宗教的關係，參Jamie S. Scott, ed., *And the Birds Began to Sing: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in Post-Colonial Cultures* (Amsterdam, Atlanta: Rodopi, 1996), xv-xxvii, 303-14.

二 倫敦會女傳教士柏嘉里的《青山》(Clear Mountain)

(一) 閱讀緣起

2006年的暑假，我為了有關香港基督教歷史的研究，出發往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 (SOAS,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圖書館，閱讀有關倫敦會的歷史檔案。有關基督教差會的歷史檔案，不外乎是年報、會議紀錄、傳教士報告和財政數據等等，正當我在這些故紙堆埋頭苦幹的時候，柏嘉里 (Katherine Brameld) 的《青山》(Clear Mountain) 赫然出現在我眼前，對比起枯燥和標準的報告文字，她那細緻溫柔的筆觸，猶如一道清澈的溪水，滋潤了我這個身在異鄉的宗教歷史學生的孤單心靈。⁶

關子尹曾說：「哲學和文學，都不是學院的專利，而是世人可以參與，是世人共同擁有的。這是生命的學問，人生在世都有權利去參與，每個人都有這樣的需求，因為這是人類追求智慧的長久需要。」⁷

誠然，文學雖然不是我的專業，但這一次與《青山》的接觸，讓我感到自身對文學的需要，也生發熱愛文學的激情。同樣，柏嘉里雖然不是文學家，但她有權去參與文學的創作，運用言語的藝術，去描述她對「青山」這處地方的感情和回憶，讓《青山》不只是停放在差會檔案館的歷史文獻，更成為能觸動心靈的傳教士文學，開拓了我們對生命的認識，豐富了人類對智慧的追求。⁸

⁶ Katherine Brameld, *Clear Mountain*, 1951-60/EA/25, CWM/LMS Archives, SOAS.

⁷ 關子尹是香港中文大學哲學系教授，引用香港中文大學的「哲學概論」課上之發言，2006年9月5日。

⁸ 有關文學的本體認識和文學的範圍，詳參袁進：《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133~172；收氏著：〈重新審視新文學的起源——試論近代西方傳教士對中國文學的影響〉，《湖南文理學院學報》，2005年9月，第5期，頁2~4。

柏嘉里的《青山》雖然以英文寫成，然而其內容卻是道道地地香港新界「青山」的實況。本文希望通過對《青山》的介紹，說明傳教士文學雖然並不是一般的官方歷史紀錄，但仍能為我們提供很多寶貴的歷史資源。香港基督教歷史並不只限於教會與牧師的歷史，也包括信徒個人每天的生活經驗。能夠開拓坐井觀天的視野和摒棄閉關自守的態度，有助我們了解基督教入華傳教士與香港基督教歷史發展的關係。

（二）作者生平

柏嘉里 (Katherine Brameld, 1906-1984)，1906年7月3日在英國出生，是英國設菲爾德埃比戴爾公理會 (Abbeydale Congregational Church, Sheffield) 的成員。她接受培訓並成為倫敦會的傳教士。她的一生主要在廣州和香港兩個地方宣教和教育。柏嘉里首於1932年被派往中國廣東省，參與婦女與兒童的佈道工作，又出任廣州市崇基聖經師範學校的教師，並為中華基督教師協會的代表。1939至1945年，她轉到香港參與傳道工作，期間經歷第二次世界大戰。1946年至1951年，她再次返回廣東省，擔任中華基督教會廣東區會婦女事工部的幹事。⁹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以後，柏氏在1951年2月重回香港，出任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執行委員會的會員，隨即被派往新界青山，負責籌辦創立香港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會所，參與香港訓練學院的工作，包括平信徒訓練、女宣教師訓練、規劃主日學訓練課程，及神學訓練和農村佈道等，在青山何福堂會所事奉達十三年之久。¹⁰

⁹ *LMS Missionary Register*, CWM/LMS Archives, SOAS.

¹⁰ 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辦公室所提供的資料。有關中華基督教會的歷史，可參《中華基督教會創會七十周年1918-1988》（香港：中華基督教會，1988）；李清詞：〈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香港的宗教》（香港：聖神研究中心，1988），頁22～25。以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憲章》（香港：中華基督教會，1974）等。

在港期間，1952年，柏氏曾擔任何福堂會所主日學小組主席，創辦光線團牧養鄉村青年，並負責擬定新界婦女工作大綱。1954年初，她曾署理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女宣教師學校的校長。1954年11月柏氏又接替晏樹庭醫生任中華基督教會上水堂籌建聖堂委員會的委員。1955年，柏氏負責推動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宗教教育事工。1956年2月，受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的委派，出任香港基督教協進會之區會代表。1959年12月至1962年底，出任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的堂務委員。1960年9月至1962年底，出任屯門堂的主日學顧問並兼任司庫。1962年至1963年，署理何福堂會所主任，直至1964年4月30日退休返英。1984年2月26日在英國養老院去世，享年77歲。¹¹

《青山》(Clear Mountain) 是柏嘉里退休後，於1971年在英國沃新(Worthing) 寫成的第一人稱小說，以表達她對「青山」何福堂會所的依戀。¹²

¹¹ 馮壽松：〈八十五年來協助及支持本堂之外國傳教士及有關牧者〉，收氏編：《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八十五週年紀念特刊 (1908-1993)》(香港：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1993)。根據馮壽松的憶述，中華基督教會屯門堂多位重要領袖，亦曾受柏嘉里所創辦之光線團的栽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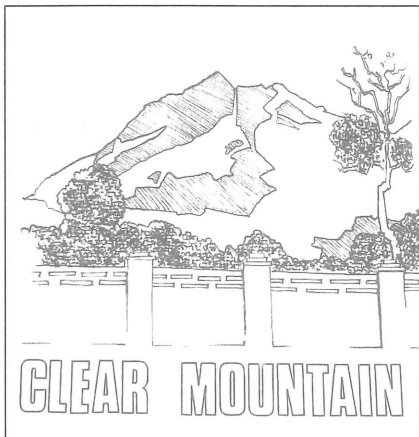
¹² 小說是指通過完整的故事情節和具體環境的描寫，來塑造人物形象，反映社會生活，思索生命意義的一種文學樣式。第一人稱小說，又稱為自傳體敘述，以「我」為敘事主體，採用自敘口吻，如魯迅的〈狂人日記〉即為一例，參張堂錡編著：《現代小說概論》(臺北：五南，2003)，頁3~8、106~108。

(三) 文本介紹

甲 封面

文本的封面由柏嘉里的朋友白希瑟 (Heather Day) 所繪畫，白氏以簡潔的素描技巧，將「青山」巍峨矗立的氣魄刻畫出來。山前的樹蔭和富有中國色彩的圍牆，讓整個畫像增添了一種靈秀之美。¹³

《青山》的封面，置於差會檔案室的歷史文獻中間，立刻被分別出來，吸引讀者的垂視，使人樂於翻看在這個寧靜清雅封面背後的文字。



在翻看內容後，讀者會發現封面所描繪的地方，正正是「青山」何福堂會所的所在地，甚至會驚訝封面是如此的深深配合「青山」的描述。¹⁴ 此外，何福堂會所的馬禮遜樓是以上海批盪和裝飾派藝術建築風格建成。最特別的就是其以青釉中式瓦片砌成的廡殿式屋頂，四角以瑞龍裝飾，充分表現中西並蓄的風格。因此在2004年香港政府更將之列為法定古蹟。¹⁵

¹³ 參考封面和鳴謝部分，Katherine Brameld, *Clear Mountain*。

¹⁴ 何福堂會所以香港第一位封立的牧師何福堂命名，「何福堂原名是進善，福堂是他的號。1817年生於南海西樵山。父親早年赴南洋謀生，在馬六甲英華書院當雕版工人。何福堂少有聰慧，因家貧未能順利升學，後到馬六甲入讀英華書院，又隨理雅各牧師學習神學、希伯來文和希臘文。曾任英華書院教職，兼助理雅各牧師教堂服務。1843年理雅各牧師將英華書院遷校香港，何福堂隨校而至；繼續學習神學，並兼教會傳道工作，至1846年被倫敦傳道會按立為牧師，何福堂可說是中國第一位華人牧師，及後派往佛山和廣州兩地傳道。」參浩然：〈何福堂是中國第一位牧師〉，《基督教週報》，2005年10月2日。何福堂著有《聖經證據》（福州：太平街福音堂，1870）。

¹⁵ 劉智鵬編著：《屯門風物志》（香港：屯門區議會，2003），頁180~181；又參〈香港法定古蹟：新界〉，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b5/monuments_79.php。

乙 書名

柏嘉里以*Clear Mountain*作為書名，充分顯示傳教士對於語言翻譯的天份和趣味。在文本中，作者曾使用羅馬拼音*Tsing Shan*來說明廣府話「青山」的音調，以顯示她所說的*Clear Mountain*，即廣府話裏的「青山」。事實上，作者在文本中也曾使用「青山」的官方英文名字，即*Castle Peak*，意思為「城堡的頂峰」。然而，柏氏沒有就這個「城堡的頂峰」的意思繼續解釋下去，卻為「青山」另外創造一個新的英文名字*Clear Mountain*，意思為「明清的山峰」，巧妙地運用了「清」與「青」的同音，以表達她對於「青山」的感受。從以上命名的例子，我們可以看到傳教士在翻譯中深思熟慮的過程以及翻譯背後所承載的故事。¹⁶

柏嘉里所描述的「青山」，即現時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屯門」，是香港十八個行政區域之一。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前，香港政府曾使用區內的一座山峰「青山」來稱呼這個地區。「青山」位於該區的西部，有583米高，「青山」與位於東面的九徑山將整個地區包圍着。有關屯門的歷史曾記載：「山靈毓秀、巍峨矗立的青山與東面的九徑山相峙如門，為古時重要港口軍事據點。」¹⁷及後，香港政府在1973年1月1日成立「屯門新市鎮」，該地區以後即被改稱為「屯門」。¹⁸

何福堂會所的地皮亦受地產商青睞，見〈新地與中華基督教會合作發展屯門何福堂項目〉，2005年1月11日，<http://www.shkp.com.hk/zh-hk/scripts/news/news_press_detail.php?press_id=3164>。

¹⁶ 文本原文為："Castle Peak, whose Chinese name TSING SHAN may be translated the Clear Mountain, now stood out even more clearly and sharply than in daylight," *Clear Mountain*, 2。

¹⁷ 青山亦因杯渡禪院而聞名，被稱為神聖的山嶺，代表了屯門的歷史和精神，見薛鳳旋：《屯門：古代海港到將來城市之演變》（香港：香港地理學會、屯門鄉事委員會，1982），頁11~15；劉智鵬編著：《屯門風物志》，頁33~44；又參〈屯門概覽：歷史背景〉，<<http://hk.geocities.com/tmlcom/history.html>>。

¹⁸ 薛鳳旋：《屯門：古代海港到將來城市之演變》，頁33~48；劉智鵬編著：《屯門風物志》，頁79~116。在<http://www.wikilib.com/wiki/%E5%B1%AF%E9%96%80%E5%8D%80>

丙 目錄

英文原稱	中文翻譯
Prologue	序言
Sunrise of the new day	新一天的日出
Beginning a community	羣體的開始
Name the house	為屋子命名
The stuff of the kingdom	天國的素材
The community growth and stretches out	羣體的栽培和伸延
The house echoes with praise	充滿讚美的回聲
"Two pence coloured "	兩便士的彩色糖
Twilight over Castle Peak	青山的黎明
End of a day	那一天的終結

有以下介紹：「青山」即現時的屯門，有關屯門的歷史：「早於新石器時代，屯門青山灣一帶已經有人居住。漢代時屯門已經有與製鹽有關的商貿活動。唐代設屯門鎮，屬安南都護府，設邊防軍駐守，『屯門』之名亦由此而來，意為『屯兵之門』。《新唐書》卷四十三《地理志》有描述：『有府二：曰綏南、番禺；有經略軍，屯門鎮兵』此為香港地名第一次在中國文獻中出現。五代南漢時設靖海都巡，於山麓上建設軍寨。宋朝置巡檢司，負責緝捕海盜。明朝建築墩台和汛房，分別派兵駐守。明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葡萄牙人佔領當時屬東莞縣的屯門，並在當地設立營寨。正德16年（1521年），廣東海道副使汪鉉在海戰中擊敗葡人，重奪屯門。史稱屯門海戰。清朝設屯門寨、墩台。清末改屬新安縣。1899年屯門隨新界交予英國統治。1900年革命黨人於屯門紅樓策劃反清活動，中國國父孫中山亦曾在紅樓居住。1950年代，聯合國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施禁運，不少人借香港的地利而偷運物資往內地。屯門就在珠江河口，成為了走私的理想地點；但與此同時，不少海盜亦看準這塊腹地，而向走私的商人打主意。1965年政府開始計劃於屯門發展新市鎮，將屯門從元朗區的範圍劃出來；1970年代政府落實屯門新市鎮的發展，並進行大幅度的移山填海。1997年屯門隨香港回歸中國。」

丁 內容

1. 太陽與青山的相隨聯想

「青山」固然是整個文本的中心，然而在文本的開始和結束，太陽的光線首尾呼應地成為「青山」的相隨者。在文本的開始，作者寫道：「太陽在青山的背後急急升起，照亮了小山頂稀疏的植被和被蛇用作庇護所的茂盛矮樹，一直延綿到空屋前的小河流。」；¹⁹ 作者最後傷感的寫到：「一如以往，我來到泳池旁，看着西方那個在青山背後早春的日落。」；「寺院的鐘聲再次響起，在我的腦海裏，我再一次攀上寺院，在各個廟堂周圍打轉，沿着彎曲的小徑向上走，走向我的青山。」²⁰

2. 五十年代香港典型家庭的刻畫

作者從最尋常的五十年代香港典型家庭開始，把香港百姓的生活用簡潔的英文描寫出來。作者這樣寫：「在中國式的小屋內，一天的第一壺水燒開了。為老太太倒一杯熱茶，將那陪她出嫁的舊綿被摺疊好，然後為將要出門到舊墟工作的先生倒茶，因為他要工作到很晚才回家。小孩子起床後，吃過昨晚剩下的冷飯和熱茶後，便趕着上學。哥哥在喝茶和吹煙過後，便乘巴士到元朗的地盤工作。這時，這個帶着草帽和圍巾的妻子才去呷一口熱茶，以準備整天在山下執拾木頭和枯草用來生火

¹⁹ 文本原文："Sunrise over the hill. The quick sunrise of the East. It lit up the sparse vegetation of the hilltop and the short rough grass, which grew taller, more lush, more wild - a shelter for snakes - the nearer it got to the creek behind the empty house," *Clear Mountain*, 1。

²⁰ 文本原文："I went and set as so often in the past, on the side of the swimming-pool, looking towards the west, watching the sun of early spring set behind Castle Peak," and "The monastery bell rang out in the gathering dusk. In thought, I climbed up again to the monastery, winding in between the buildings, following again the path that led upwards, winding, zigzagging to the very top. Tsing Shan, the Clear Mountain," *Clear Mountain*, 41。

做飯。」²¹ 看似簡單的故事，作者卻能生動地描繪出香港五十年代家庭生活的面貌，這成為她的同鄉認識香港的重要來源。

3. 青山地理的描寫

「何福堂會所」這個主角未出場前，作者繼續描述「青山」的地理環境，讓讀者一步一步的走進「青山」的意境裏。她這樣寫：「太陽的光線經過新墟的村落繼續沿着青山發熱，那空屋子全然美麗，她面對着青山，就是那個為我們全區命名的青山。從屋子的後園你可以直接走到小山上；在空屋的左邊就是可以遙望大嶼山的沙灘；在右邊你可以看到青山的山麓伸延至屏山，若你向着這邊一直走，你會發現你跟中國大陸是沒有隔阻的。」²²

²¹ 文本原文："From the Chinese huts near the bottom of the hill rose the thin blue smoke of kitchen fires, boiling the first water of the day, poured into the thermos, that modern standby of Chinese households. A drink of tea for old grandmother, throwing aside the ancient patched quilt (newly made and padded for her wedding years ago) facing another day of looking after the empty home when the family had gone their several ways. Tea for her son before he left for the Old Market, less than a mile away where he was employed till late at night at an eating house. Tea and some cold rice left from the previous night for the children who would soon be off to school. Tea and a cheap cigarette for their eldest brother who took the bus up to Yuen Long where he was learning the building trade. And finally, tea for the wife, who after seeing to the needs of mother-in-law, husband and children donned her big circular hat of woven straw, with its six-inch fringe of dark blue cloth protecting neck and face from the rapidly strengthening sunlight. She would spend all day on the local hill-sides picking up wood and dried leaves and grass for kitchen fuel," *Clear Mountain*, 1。

²² 文本原文："The sun on its journey westwards had moved up the mountain on the opposite side of the valley. It had crossed the village of San Hui (New Market) and was illuminating the slopes of Castle Peak. The empty house was set in the midst of sheer beauty. You could go through its back garden straight on up the hill behind it. And in front it faced Castle Peak Mountain, which gave its name to the whole district. To the left, and only a little way down the road, was the sea, and in the far distance were the higher mountains of Lan Tau Island. To the right, the saddle of Castle Peak stretched away towards Ping Shan, and if you walked along the top of its, you saw the sea far on the other side, and knew there was no other land area between you and the Chinese mainland," *Clear Mountain*, 1-2。

事實上，當我們翻查屯門的地理位置，發現作者的描述是十分準確的，讓未曾到過青山的人，仿如置身其中。根據有關屯門的地理介紹：屯門的北面是元朗，東面是荃灣，西面是珠江口、南面與大嶼山隔海相望。屯門的中心有青山和九徑山，北面有圓頭山和元朗平原，南面就是青山灣。²³

4. 傳教士在港的生活細碎

1949年中共建國，基督教在華的發展遂出現新的轉折，此即自1950年9月「基督教三自革新宣言」的發表，所有外國傳教士也先後離境，甚至返國。自此，教會無論在治會、傳道及財政上，全由華人負責。1949年隨着中國政局的不變，國內的基督教會，由於中共新政權推行三自教會而告結束。然而，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卻在英國殖民地的宗教自由政策下而繼續發展。自立後的中華基督教會得以在港另闢新局。²⁴ 雖然教會還得以繼續在港發展，但傳教士離開中國後的下場，卻沒有得到多大的注意，柏嘉里即為一典型例子。

柏嘉里在文本中亦提及以上歷史的轉折，香港的華人信徒經過百多年來的學習，已能夠獨當一面掌握教會的發展。其時，雖然有不少傳教士從內地來港，但他們卻不一定在香港教會受到熱烈歡迎。反之，柏嘉里提到傳教士在這個時期的角色，就如冗員一般，被教會安置在多餘的崗位。柏嘉里在1951年2月來港雖被安排籌辦何福堂會所的建立，然而，她在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卻並非擔任領導的角色。甚至，在文本的最後，柏氏亦描述其在何福堂會所的工作並沒有獲得很大的成效，最後黯然離港。²⁵

²³ <<http://www.wikilib.com/wiki/%E5%B1%AF%E9%96%80%E5%8D%80>>

²⁴ 參拙著：《一個華南客家教會的研究——從巴色會到香港崇真會》（香港：宗文社，2002），頁46。

²⁵ 見Clear Mountain, 1, 4, 40-41。

除此以外，柏氏亦在文中提及一些生活雜碎，例如西方人為表示禮貌而勉為其難使用筷子²⁶ 以及西方人留在自己的房間吃西式早餐²⁷ 等，都反映西方人在港生活的文化差異。

5. 何福堂會所的回憶緬懷

在序言中的空屋繼續在文本中出現：「太陽的光線穿過被遺棄的空屋。大白天的時候，村民盡量利用匿大的空地和涸乾的泳池來烘乾冬天的衣服、乾果和過於芳香的鹹魚。」²⁸ 作者從空置的大屋說起，再從大屋的歷史和命名，後來成立的平信徒訓練中心，建築物的變遷以及教會對社區的種種服務（識字班、普光團和光線團）來回憶和緬懷何福堂會所。²⁹

何福堂會所絕對不單單是柏氏個人喜愛的地方，2004年3月，香港政府根據《古物及古蹟條例》宣布將屯門何福堂會所的馬禮遜樓列為法定古蹟，以表揚何福堂會所見證了香港在近代中國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中所扮演的獨特角色。³⁰ 正如柏氏在文本中所提到，這座空屋子曾是抗日名將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將軍（1892-1968）的別墅。1946

²⁶ 見 *Clear Mountain*, 2。

²⁷ 文本原文：“The westerners still kept to their usual breakfasts in their flats,” *Clear Mountain*, 19。

²⁸ 文本原文：“The sun passed over the big empty house, standing forlorn in its unkempt grounds. The empty house was of some use to the village people (in the daytime when ghosts did not walk abroad) for the cemented playing-ground and the empty swimming-pool were splendid drying grounds for winter clothes that needed airing, for grain or other stored foods that needed occasional exposure to the sun, and for the drying of salted fish which left behind its particular pungent aroma,” 見 *Clear Mountain*, 2。

²⁹ 見 *Clear Mountain*, 2-41。何福堂會所是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屬下一個平信徒訓練和集會的地方，有關該會所的歷史，可參〈介紹何福堂會所〉，《知己知彼——宗教專題講座集》（香港：何福堂會所，1961），頁33；〈緬懷集：何福堂會所——豈止退修營地咁簡單〉，《匯聲》，2003年4月，第548期，頁6~7及浩然：〈屯門何福堂有段古〉，《基督教週報》，2005年9月25日。

³⁰ 參〈政府擬將何福堂會所內的馬禮遜樓列為古蹟〉，〈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b5/news_mb.php〉。

至1949年間，又曾被用作達德學院的校舍，該學院由周恩來和董必武創辦，多位著名的中國學者曾在此講學，培育不少年青知識分子。足見，何福堂會所的前身，作者文中的空屋，不僅是烘乾衣服和乾果的地方，更是大有來頭。³¹

6. 黯然的離去

文本的最後部分，讓人讀來黯然神傷。作者在文中不斷鋪排對「青山」和「何福堂會所」的熱愛，然而十多年後，教會竟以一個並不十分充分的理由結束何福堂會所的工作，並將之改建為中學，成為現在的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³²至此，作者亦因為何福堂會所工作的結束而要退休離港返英。作者在〈那一天的終結〉寫到：「颱風維達的吹襲，我和精力耗盡的本地職員去清理那些吹破了的窗戶和被水浸濕了的教堂」；「這裏再沒有早禱，也再沒有晚禱」；「於是我起來清潔和收拾櫃子，將好些東西送給我從前的學生，將一些帶回英國，其餘的就讓它燒毀」；「被不確定或失敗的漩渦籠罩，是否能夠給我們更清楚的異象？我們失敗了？看來好像是失敗了。」³³以上是作者將要離去何福堂會所之沈重而哀傷的描寫。

³¹ 文本原文："It was an old place - at first a private house belonging to a rich Chinese - then used by the soldiers, and finally for a short time, a Communist School," *Clear Mountain*, 10, 又參<http://www.lcsd.gov.hk/CE/Museum/Monument/b5/monuments_79.php>。

³² 1963年9月何福堂書院正式上課，有關何福堂書院的歷史和發展，見〈何福堂書院〉，《中華基督教會創會七十周年1918-1988》（香港：中華基督教會，1988），頁90；劉嘉敏編：《福集：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學生文集》（香港：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2001）及《中華基督教會香港區會何福堂書院創校三十週年紀念特刊》（香港：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1993）。香港文學家小思（盧瑋鑾）所編著的《香港文學散步》（香港：商務印書館，1991）也述及何福堂中學，頁169~175。

³³ 文本原文："Typhoon Wanda (a bad one) disrupted the Colony for two or three days. With depleted domestic staff I coped with broken windows and water that swept under the chapel doors from the flat roof."; "There were now no prayers in the chapel either morning or evening."; "I then cleaned out my own cupboards, gave away a good bit of my material to former students who could use it - packed some more to take to England - and burnt whatever was left."; "Had it given us a clearer vision only to cover it again with the swirling mists of uncertainty and failure? Had we failed? It looked very like it," *Clear Mountain*, 37-41。

三 傳教士文學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範疇的角色

正如前文所述，在過去的學術研究中，香港基督教史之研究多着重官方的文獻資料，來對教會進行通論式的研究。然而，對傳教士文學的運用，卻可以幫助我們發掘更多不同層次的議題。因此傳教士文學作為史料和議題開拓的導體，也應該得到學界的重視。下文嘗試通過對《青山》的研讀，發掘傳教士文學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角色，包括基督教女性文學的啟示、傳教士與華人的中西身分互相了解及香港基督教史料際整合的研究等三方面。

（一）基督教女性文學的啟示

柏嘉里作為一位女性傳教士撰寫《青山》，其內容也不乏有關女性的題材，文本特別提到柏氏成立普光團 (Po Kwong Tuen, Spreading the Light Club) 對鄉村少女的啟導；女宣教師訓練學校成立以及女宣教師與識字班及兒童工作的獨特關係；徙置區女童於暑假到何福堂會所參加退修會穿着整齊衣服游泳的情景；以及亞洲婦女基督徒會議 (Asian Church Women's Conference) 日本女牧者別開生面的聖餐崇拜等等，都顯示了女性作者對於選題的分別。³⁴ 除了選材方面，正如前文所述，柏嘉里的文字和寫作手法，跟存放在差會檔案館其他以男性作者為主的報告記錄，顯然有極大分別。因此，研讀女傳教士撰寫的作品，將為我們帶來了解傳教士入華歷史的嶄新視野。³⁵

³⁴ 見 *Clear Mountain*, 13-16, 32。

³⁵ Erzsebet Barat, "The Discourse of Selfhood: Oral Autobiographies as Narrative Sites for Constructions of Identity," in *Representing Lives: Women and Auto/biography*, Alison Donnell and Pauline Polkey, ed. (Basingstoke: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2000), 165-173.

近年來，女性文學在女性研究或性別研究領域上，起着極大的作用。在父權的語言文化和社會制度的影響下，女性的角色往往被忽略以致無從發聲。女性研究學者通過對女性文學的研讀，來詮釋和演繹女性的生活形態，因此，女性文學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資料來源之一。女性作者所選擇的美學表現形式往往透露出其性格、心態和社會觀，而不同的時代和社會也會影響到某些女性文學形式或種類的發展。女性作者的個人性格及時代、社會背景都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從她們的寫作，我們可以從中窺探當時社會文化，以及作者風格與社會風氣的微妙互動關係。³⁶

（二）傳教士與華人的中西身分互相了解

柏嘉里《青山》的其中一章是〈兩便士的彩色糖〉(Two pence coloured)。作者特別使用了英國諺語penny plain and two pence coloured為該章的主題。這句說話的意思是，一便士的糖果平淡而無味，兩便士的糖果則是色彩繽紛的，為要說明生活要活得精采的道理，猶如兩便士的彩色糖一樣。作者的寫作不單讓我們學會了一句英國諺語，更讓我們了解作者對自我的要求和對生命的理解。³⁷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歷史上，傳教士文學除了作為西學東漸和中學西渡的媒介外，更可以作為中西雙方對自我和對方身分互相了解的載體。³⁸ 從西方傳教士的角度來看，第一層次上，傳教士可以通過中國

³⁶ 參Linda S. Coleman, ed., *Women's Life-Writing: Finding Voice / Building Community* (Bowling Green: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Popular Press, 1997), 1-10; Wong Wai-ching, *The Poor Woman: A Critical Analysis of Asian Theology and Contemporary Chinese Fiction by Women* (New York: P. Lang, 2002), 1-9, 129-31.

³⁷ 見*Clear Mountain*, 31。

³⁸ 有關傳教士以及其著作在中西文化交流的角色，參羅香林：《香港與中西文化之交流》（香港：中國學社，1961），頁15~76；Wong Man-kong, *James Legge: A Pioneer at Crossroads of East and West* (Hong Kong: Hong Kong Educational, 1996), 49-98.

文學擴大自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第二層次上，傳教士通過翻譯，讓西方人士有機會閱讀中國經典與文學，即前文所述的中學西渡；第三層次上，傳教士通過文字，書寫有關中國文化與文學的領會，通過個人的詮釋和融合，創作出對中國文化獨有的觸角，傳教士文學成為具有影響力的管道，去模塑西方人士對中國的了解。亦即本文所述傳教士文學促進了西方對中國人身分的理解，甚至創作了西方人對中國人形象的詮釋。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第一層次上，我國人民亦可以通過傳教士的翻譯，了解西方文化、生活與文學經典，就是前文所述的西學東漸；第二層次上，通過傳教士對我國生活的描述，亦幫助我們從他者的語言，了解自身文化和形象。傳教士文學亦可成為塑造我國自我形象的來源之一。因此，傳教士的文學，幫助我們重新審視，甚至發現自我和了解對方的身分。³⁹

（三）香港基督教史科際整合的研究

從《青山》的例子，我看到的不單是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範疇的擴大，同時亦有利於對宗教和文學的認識。學界對科際整合研究的鼓吹，並不是單向的，而是互動的。《青山》的研究，可以同時作為宗教學，歷史學以及文學等學科的研究範疇。傳教士文學的研究，可以是眾多學科科際整合的導體。⁴⁰

就宗教研究的領域來說，傳教士文學是宗教學的一部分，通過傳教士的寫作，分析西方傳教士的宗教觀念，傳教手法以及與傳教對象的關係等等。此外，從傳教士文學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作者的性格與期

³⁹ 語言 / 文學跟社會身分構成的關係，參Anna Duszak, ed., *Us and Others: Social Identities Across Languages, Discourses and Cultures* (Amsterdam, 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2002), 1-28.

⁴⁰ 有關科際整合的提倡，參Committee on 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Facilitating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Washington: National Academies, 2005), 16-25.

許，世界觀與價值觀，生活方式與所身處的社會狀況，這些都有助我們了解宗教及宗教與社會的關係。⁴¹ 就歷史學研究的領域而言，傳教士文學是歷史學的一部分，生動活潑和感情豐富的傳教士文學作品，為了解近代中國基督教入華歷史的一個另類史料，增加歷史的趣味和人情味。同時，文學亦可以作為研究社會歷史和文化歷史的史料來源，因此，文學亦是社會史和文化史的一部分。⁴² 文學研究領域方面，傳教士文學屬文學一部分，特別是基督教來華傳教士在新文學的起源、現代作家的催生以及西學東漸和中學西渡的媒介的貢獻上。

四 總結

「傳教士文學」在宗教歷史研究的範疇裏，可能從來也不是一個熱門的主題。「基督教來華傳教士」在中國文學研究的領域裏，可能從來都不是一個主要的題目。一直以來，我也不曾深入認識以上的題目。直至2006年夏天，我在英國倫敦大學亞非學院圖書館的地窖裏，跟柏嘉里的《青山》相遇以後，才對以上研究題材的看法改變了。

對我來說，通過對柏嘉里《青山》的研讀，「基督教來華傳教士」再也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名詞。《青山》讓我通過語言的藝術，認識這位英國女傳教士，寫於香港新界青山異鄉的遭遇和經驗，以及其心底裏悲喜交集的感受。⁴³

⁴¹ Scott, ed., *And the Birds Began to Sing*, 303-14.

⁴² John S. Wills and Hugh Mehan, "Recognizing Diversity within a Common Historical Narrative: Culture, Hist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Life," in *Contested Terrain: Diversity, Writing, and Knowledge*, ed. Phyllis Kahaney and Judith Liu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1), 21-50.

⁴³ Liz Stanley, "Is There Life in the Contact Zone? Auto/biographical Practices and the Field of Representation in Writing Past Lives," in *Representing Lives: Women and Auto/biography*, ed. Alison Donnell and Pauline Polkey (Basingstoke: Macmillan; New York: St. Martin's, 2000), 3-30.

從這個小說式的傳記回憶，我彷彿可以跟作者回到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青山，跟她一同去呼吸那個時代的氣息，甚至超越時空地跟作者成為知心的朋友。

這是我初次遇上傳教士文學的體驗。盼望這種研讀的激情，不單有助我們對宗教學、歷史學以及文學等人文社會科學科際整合研究領域的了解，同時也能夠提升香港基督教史研究者對傳教士文學研究的興趣。

撮 要

傳教士文學也可以成為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史料之一，並能為該範疇開拓更多的研究課題和方向。本文即嘗試利用差會檔案館所藏的女傳教士文獻史料，來論述傳教士文學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範疇的貢獻。本文首先介紹倫敦會女傳教士柏嘉里 (1906-1984) 於1971年寫成的《青山》，並繼而以此文本作為分析的對象，以剖析傳教士文學在香港基督教史研究的角色，即基督教女性文學的啟示、傳教士與華人的中西身分互相了解，以及香港基督教史料際整合的研究等等，期望幫助我們對香港基督教歷史的面貌有更多元的了解。

ABSTRACT

Missionary literature is one of the precious sources for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Christianity. It helps to enrich the research areas and issues on the field of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Christianity. This article uses the archival material of The 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LMS) to illustrate the contributions of the missionary literature to the stated field.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us *Clear Mountain*, a novel written by a woman missionary of LMS, Katherine Brameld (1906-1984). From the text, the author helps us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role of missionary literature in this specific research field, namely, the shine from the Christian women literature, the mutual understanding between the identities of Chinese converts and foreign missionaries, and the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tren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Christianity. This article provides with us a multi-facets understanding of the history of Hong Kong Christianity.